

城市跨国空间重构 及其全球-地方互动治理机制

——德国杜塞尔多夫市的案例研究

李子枫 黄耿志 薛德升

【摘 要】全球化深刻地影响了城市空间,促使城市内部分化出新的空间类型——跨国空间,引起学者对其形成及发展动力的关注。然而,这些研究较少涉及跨国空间内部的重构问题与治理机制。本文以全球化语境下城市空间重构的多元维度为基础,建立德国城市跨国空间重构与治理分析框架,采用定性分析为主、定量分析为辅的研究方法,探讨杜塞尔多夫市城市中心地区与边缘地区的三个跨国空间重构案例。研究发现:①跨国空间重构是治理模式重组下的空间策略。②跨国空间治理是多尺度下多个主体的相互作用,是跨越行政区划边界的、纵横交叉的全球-地方网络状组织结构和行动模式。③多层次网络是跨国空间重构得以实现的基础,多主体的网络状互动是多层次网络发挥作用的关键,多项目联动治理是实践手段。④跨国空间治理是正式规划实践与非正式措施的结合。⑤多项目联动有利于城市空间的均衡发展,提高城市国际化发展的质量。

【关键词】跨国空间;空间重构;治理机制;全球-地方互动;杜塞尔多夫

【作者简介】李子枫(1988—),女,广东广州人,博士,博士后,主要研究方向为跨国投资、城市更新与城乡规划,E-mail: lizifeng5@mail.sysu.edu.cn,中山大学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广州 510006),南方海洋科学与工程广东省实验室(珠海 519000);黄耿志,中山大学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广州 510006),南方海洋科学与工程广东省实验室(珠海 519000);薛德升(通讯作者)(1969—)山西祁县人,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城市地理与城市规划,E-mail: eesxds@mail.sysu.edu.cn,中山大学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广州 510006),南方海洋科学与工程广东省实验室(珠海 519000)。

【原文出处】《地理研究》(京),2023.11.2899~2913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2101197、41930646、42122007);南方海洋科学与工程广东省实验室(珠海)海洋可持续发展创新团队建设项目(311021018)。

1 引言

随着全球化、城市化与城市转型的相互交织与持续推进,城市空间发生着剧烈的变化^[1]。在资本、权力和抗争力量等驱动力的作用下,城市活动不断集聚、扩散和再集聚,城市空间经历着结构重组、功能重塑等发展挑战^[1-4]。城市空间结构是多尺度要素在空间上的投影,空间重构包括物质、经济与社会等多种空间要素的重新组合与再结构化,这既是多重

因素长期相互作用的过程,也是空间结果^[5-8]。

中、西方城市都面临着空间重构的问题。欧美大量收缩城市(Schrumpfende Städte)出现人口规模减少和发展停滞等结构性危机^[9],凸显了城市内部空间优化与功能重构的重要性,内部发展和改造优于城市扩张。在中国,城市转型导致了不同尺度的城市空间重构,在城镇化和工业化发展较快的地区,重构行为较为活跃^[4,10]。

跨国空间是全球化时代城市内部分化的一种新的空间类型^[11]。国内外研究主要围绕其形成机制、类型与发展动力,把研究重点放在市中心地区,强调了国家权力、城市政府、跨国投资、移民主体的主导作用,讨论了全球与地方之间的互动关系^[11-13]。但现实情况是,跨国空间中的关系一直在持续发展和重塑^[14,15],空间重构是多尺度之间的相互作用,重构不仅发生在城市中心,也发生在边缘地区。在城市内部会同时发生多个跨国空间的重构。这些现象在已有的研究中尚未得到充分解释。德国是城市空间均衡发展的典型^[16],本文以杜塞尔多夫市为例,从尺度重组、多元素互动和多层次治理等三个方面出发,分析跨国空间重构实践的多重维度与治理机制。

2 城市跨国空间重构的多重维度

城市是跨国资本运作的空间基点。空间尺度重组、多要素互动、多层次治理和多样化规划手段在城市跨国空间重构中得到强烈体现。跨国空间不仅是全球和地方相互作用而产生的跨国活动场所,也是在地方日常生活实践中被生产与再生产的空间,经历了去地方化—跨国化—全球化—再地方化的复杂过程^[15,17-19]。全球背景、国家环境和地方场所共同构成的空间重构,是一个不可分割的“全球-国家-场所”交互作用体系^[6,20]。

2.1 关系转向与尺度重构(re-scaling)

全球化语境下,城市地理学者利用关系视角和网络思维,将关系视为纽带,将空间和关键主体视为节点,综合分析跨尺度下要素流动对全球经济景观的重塑作用^[20],涌现了关于流动的空间、全球城市、世界城市网络等相关研究。全球化进程被重新定义为一种竞争的、混杂的、不均衡的、持续的、尺度间关系的重构^{[21]20-45}。

全球化的城市肌理充满着复杂的尺度化安排,尺度被认为是城市化的重要方面,城市是多种形式的尺度重构的竞技场与目标^{[21]87-114}。全球-地方体系的产生,尺度的等级结构与尺度之间的网络被嵌入到城市中——包括超城市尺度、超国家尺度、次国家尺度^{[21]87-114}。城市空间的尺度重构,强调的是关系过程,是“再地域化”而非“去地域化”^[22-24]。因此,尺度涉及了空间、权力、关系等要素,以尺度为中心的研究

应采取更加多元化的方法,在多尺度下分析同一现象或过程的不同表现^[20,25,26]。

2.2 规划与治理模式重组

尺度重构引发了城市空间规划重组和治理重构。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新国际劳动分工的加强、欧洲一体化的加速、空间竞争的加剧与转型过程的复杂化中,欧洲城市经历着剧烈的空间重构,促使城市推行一系列促进空间协调发展、嵌入跨国经济循环的规划新形式^{[21]206-232}。空间规划是德国提高全球竞争力、强化衰退地区、促进城郊均衡发展的空间工具与制度响应,自上而下分为“欧盟→联邦→州→地区→城镇”五个尺度维度^[16,27]。

政府管制和治理重组需要多部门的统筹与协调。在城市跨国空间中,全球和本地参与者通过实践融合产生治理重组,影响城市的新陈代谢和跨国空间的发展形态^[18,28,29]。现代化的国家政府、省级政府、城市政府、城市内部权力机构等机构的管制和协调,已经不是有边界的独立存在,而是与自然交织在一起^[30],影响着城市空间的实践。因此,尺度重构更多体现在治理过程中的制度创新和柔性调整上,而不是直接调整城市的行政区划^[31]。

2.3 跨国空间重构的分析框架

德国城市空间重构是尺度重构与治理模式重组背景下,城市应对全球化发展的空间策略^[32]。本文借鉴了“联动”(linkage)的概念,解释空间重构的多项目联动模式。联动,即联系与互动,是在一定机制运行下,同一个系统内每两个或多个环节之间通过要素流动引发对方或多方持续产生的变化,具有多空间尺度、持续动态发展、认知反馈等特性^[33-36]。德国跨国空间重构以多层次空间规划体系与网络化组织为基础,形成多尺度、多主体、多项目联动的全球-国家-地方互动式治理模式(见下页图1)。第一,多尺度包括超国家、国家、超地方、地方、机构和个人等层面。第二,多主体指上述各种尺度的行为主体。超地方、跨学科、跨部门的多元主体组成跨国空间重构的治理结构。多主体通过主体协商、博弈、调整、解决、执行等过程,持续参与到项目的规划、决策和实践中^[37]。第三,多项目联动是指从城市中心到城市边缘,在多个地区同时或连续启动多个项目,使发展

战略在社区层面及时推进。针对不同类型的空间,采取灵活的处理方式,确保城市空间的均衡发展。第四,正式工具和非正式工具的组合运用。非正式规划不具备法律效力,属于法定规划系统之外的手段,是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正式工具的必要补充^[38]。非正式规划工具通过非标准化的方式寻求解决方案,优势在于参与门槛低、开放性强、效率高和问题导向,消除规划过程中由于社会或其他不利因素而产生的群体劣势,从而实现多行为者和多层次网络治理^[38,39]。

总之,城市空间重构是传统规划与现代化的对抗性融合,涉及发展均衡、资源分配、社会公平等问题^[40]。在现有研究中,德国与中国的城市空间重构与治理存在着普遍性和特殊性。德国城市实施以空间规划为指导的阶段式重构,与中国城市类似^[41]。但是,德国已经形成了多中心发展模式 and 较为均衡的空间结构,多层次规划体系比较成熟,城市边缘地区也受到重视。目前,中国大城市也开始尝试将重心从空间规模扩张向结构优化和多中心发展转变^[8]。中国城市边缘区是城市最敏感的地区之一,存在功能、空间和政策等诉求,考验着城市的治理能力^[42,43]。

在空间重构的治理上,德国在网络化模式的基础上,更加强调区域和城市尺度,出现社区管理等创

新模式^[32],实现了多要素在多尺度上的组织与互动。中国的治理体系中,国家尺度不可忽视,虽然行政力量仍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像北京、上海等城市已出现多元主体相互协商,从增长型治理向公平型治理的转变^[44,45]。

3 研究区概况与研究方法

杜塞尔多夫市原是莱茵河畔的一个小渔村,在城市化与全球化的交互作用下,发展成为世界城市。20世纪80年代,城市面临由后工业化转型和人口老龄化引发的一系列城市收缩问题。这与目前中国部分城市的状况相似——在全球化与区域一体化浪潮中出现了城市增长与收缩并存的现象,收缩现象在东北地区最为严重,其次是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46,47]。杜塞尔多夫市经过长时间的空间实践后重新恢复活力,为中国空间实践提供了发展思路。

本文选取了城市老工业区、中心区和边缘区三个具有代表性的跨国空间重构案例(见图2),深入分析空间治理机制。案例一城市老工业区媒体港(Medienhafen)属于跨国经济与生产空间,见证了城市产业转型的过程。案例二是位于城市中心的日本区(Das japanische Viertel)。日本元素塑造了跨国氛围。案例三跨国社区加拉特(Garath),位于城市郊区。加拉特居住着大量拥有移民背景的居民。

德国项目实施时间较长,本文的研究工作始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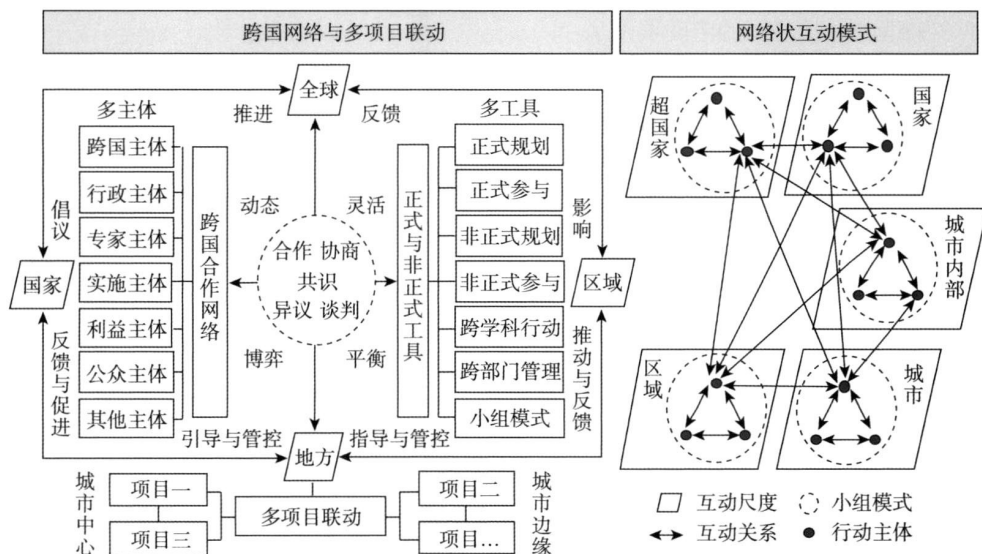


图1 跨国空间重构的多层次、多项目与多主体治理的模式

Fig. 1 The multi-level, multi-project and multi-actor governance model of transnational spatial reconstructio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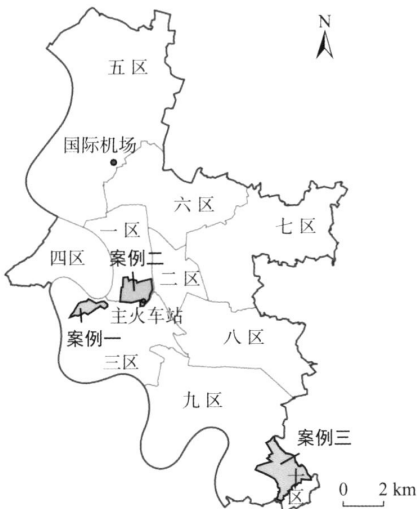


图2 杜塞尔多夫市三个跨国空间重构案例地理位置示意

Fig. 2 Location of three cases in Düsseldorf

注：该图基于杜塞尔多夫城市地图服务网站(<https://maps.duesseldorf.de/>)下载的标准地图绘制,底图边界无修改。

2011年,到2021年结束。采用定性分析为主,定量分析为辅的研究方法,通过长时间跨度的实地考察、访谈、参与式调研和文本资料研读等方法获取研究资料和数据(见表1)。定性研究方法包括访谈法、直接观察法、参与观察法及文本分析法。对专业人士的半结构化访谈时间长为90~120分钟;对居民与跨国企业人员的访谈为非结构化非正式访谈,时长30~60分钟。定量数据来源于实地调研、各级政府以及商协会的统计数据、企业官方网站等,数据主要用于统计分析居民人口结构和制作日本企业空间分布图。

4 城市跨国空间的形成与发展

杜塞尔多夫市在世界城市研究小组(GaWC)的世界城市排名^[48]从2000年的二等级发展到2020年的二等级+(下页图3),成为德国五个重要的国际经

表 1 Tab. 1		研究方法 & 数据来源 Survey process and details			
研究方法	方式	地点/来源	时间	对象/内容	
定性方法	实地调研	案例一	2011 年 5–6 月	港口设施、公共空间、建筑景观、展览活动、文化艺术画廊	
			2014 年 6 月		
			2016 年 6、10 月		
			2018 年 8–9 月		
		案例二	2014 年 2 月	日本服务业行业、基础设施与日本机构;日本居住区与可视化的跨国元素	
			2017 年 7 月		
			2018 年 8 月		
		案例三	2018 年 7 月	社区邻里、社区中心、社区活动、公共空间	
			2020 年 10 月		
			深度访谈	城市政府部门	2011 年 6–7 月
	2015 年 6–8 月	州投资促进署负责人、城市经济发展办公室负责人、德国国际合作机构负责人			
	2018 年 8 月	城市规划局港口开发部门			
	非正式访谈	案例一		2011 年 5–7 月	企业员工、游客, 共计 21 人/次
			2018 年 8–9 月		
案例二		2017 年 7 月	日本服务行业的经营者、跨国空间的消费者、游客, 共计 16 人/次		
		案例三			2018 年 7 月
参与式观察		城市内部	2016–2019 年	“日本节”文化庆典活动、案例地的其它相关活动; 研讨会议、港口展览、专家讲座、日本动漫展览	
文本与资料	文本文件	2018–2020 年	政府公开文档、访谈获取的文本材料官方网站、活动公告、新闻、媒体记录视频和音频文件		
定量方法	企业数据收集	案例一	2011 年 7 月	实地采集 129 家企业数据	
			2016 年 10 月		
		案例二	2012 年 11 月	实地采集 206 家日本企业数据	
			2017 年 7 月		

(续表1)

研究方法	方式	地点/来源	时间	对象/内容
			2018年8月	
企业数据核实	互联网		2021年	联邦政府企业注册平台(https://www.bundesanzeiger.de/pub/de/start?3)、杜塞尔多夫日本工商会(https://www.jihk.de/de)和206家日本企业的官方网站
城市数据收集	城市政府网站	2020–2021年		城市政府网站(https://www.duesseldorf.de/)中的城市排名、经济、社会、人口数据

注：本文中的日本企业数据经作者在德国联邦政府企业注册平台(<https://www.bundesanzeiger.de/pub/de/start?3>)上对企业经营状态、地址、管理层国籍等信息进行核实，在剔除非相关企业后，得到206家日本企业数据。

济中心之一，是莱茵-鲁尔大都市区的核心城市^[49]。

城市对跨国移民具有吸引力。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外国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呈现持续增长趋势，2012年后增速加快(图4)。到2021年末，城市外国人口占比23.8%^[50]，案例一所在的城市片区(Stadtteil)外国人口占比28.7%，以土耳其、波兰、葡萄牙、奥地利和希腊籍为主；案例二所在的城市片区外国人口占44.7%，其中日本人口最多，占片区人口的10%；案例三所在的城市片区外国人口占24.4%，以叙利亚、伊拉克、波兰、俄罗斯和乌克兰籍为主^[51]。

目前，城市拥有约40个国际领事机构，30多个外国商会和外贸组织，是欧洲第二受欢迎的外资目的地，在2016至2022年期间，城市跨国公司数量增长超过27%^[53, 53, 54]。日本是城市外资的主要来源国，日资企业在城市一区(Stadtbezirk 1)分布最为密集、历年新增企业数量最多(图5)。

4.1 城市老工业区跨国空间重构：媒体港

案例一媒体港最初建于1896年，是城市主港(Düsseldorf-Hafen)的一部分，曾是德国重要的进出口贸易港口。1974年，城市决定将主港中面积约33万m²的地块进行改造，“这是多个部门经过长时间讨论的结果”(港口开发部门2011年6月访谈内容)。项目分为4个发展阶段，总投资额约12亿欧元。第一阶段1976至1991年项目在德国谨慎城市更新理念的指导下，以重新利用港口工业荒地，提高土地价值为目的。1992至2003年是第二阶段，在保护港口遗产的前提下，提高土地利用密度，优化建筑内部结构。2004至2012年是第三阶段，媒体港成为城市营销的旗舰项目，代表着城市的国际化形象。2012年至2020年的第四阶段以实现全球化战略为目标，媒体港是实现世界城市形象的空间载体和发展引擎。作为城市发展定位的缩影，“媒体港代表着城市发展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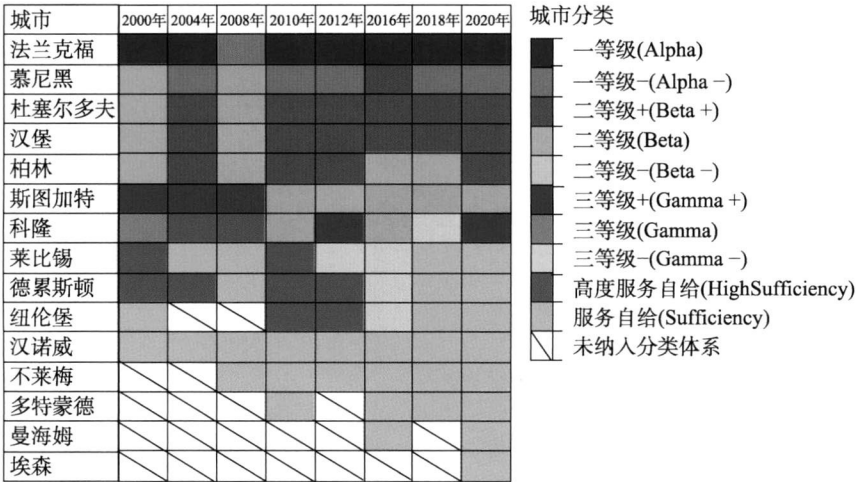


图3 德国的世界城市历年变化情况

Fig. 3 The ranking of German world cities over years

数据来源：根据文献[48]中的城市分类进行绘制。



图4 1980—2020年城市外国人口占总人口比例
Fig. 4 Percentage of foreign population in the city from 1980 to 2020

数据来源于文献[50]、[52]。

目标和最高级别的经济结构”(港口开发部门2018年

8月访谈内容)。如今,媒体港集聚了大量跨国公司、高级生产性服务业,成为国际商业成熟度高、具有核心竞争力的城市空间。

4.2 城市中心跨国空间重构:日本区

案例二日本区位于在城市一区的市中心片区(Stadtmitte)。日本跨国元素在过去60多年重塑了城市景观,形成了跨国“微型社会”(miniature society)^[55]。“早在(20世纪)60年代,城市的日本投资热潮,一直持续到80年代,那是日资的黄金年代…随之而来的是包括学校和幼儿园在内的各种服务设施”(州投资促进署2015年8月访谈内容)。跨国元素从开始的单一,发展到如今多样的跨国经济空间、多元的跨国社会文化空间以及由政府与非政府机构组成的跨国政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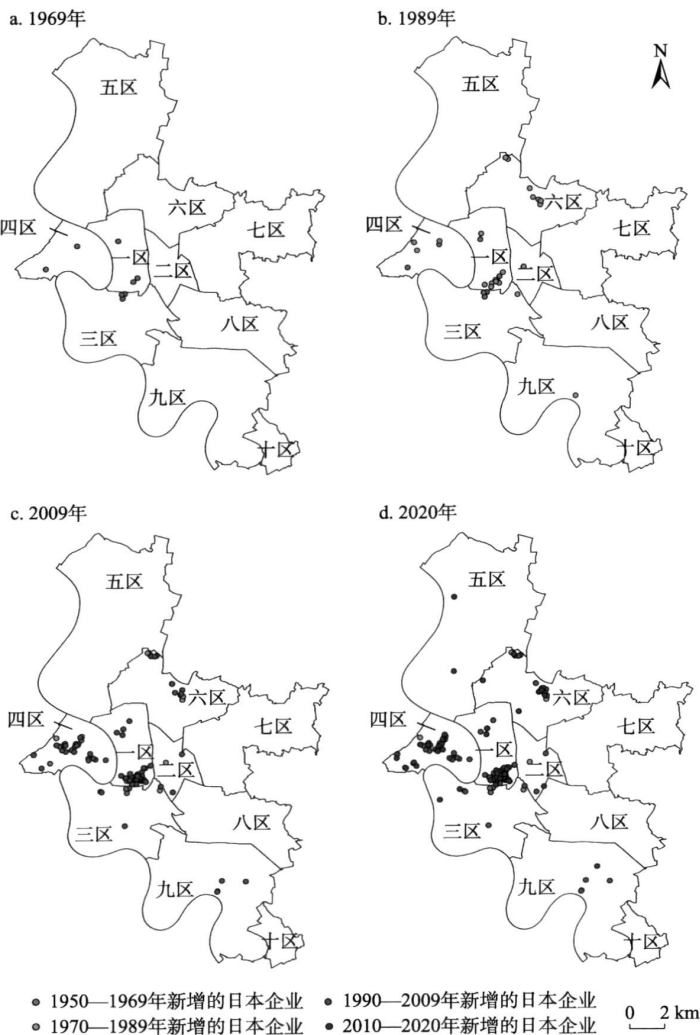


图5 杜塞尔多夫市历年新增的日本企业空间分布

Fig. 5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Japanese companies in Düsseldorf

注:该图基于杜塞尔多夫城市地图服务网站(<https://maps.duesseldorf.de/>)下载的标准地图绘制,底图边界无修改。

空间^[56]。大部分日本移民是具有较高学历和管理职位的跨国企业职员,是当地经济地位较高的移民群体,非常重视生活质量与族裔社交网络^[57-60]。案例二共有65家日资企业,占全市日资企业的31.55%,其中,伊默曼大街(Immermannstrasse)的两侧分布最多(见图6)。

4.3 城市边缘跨国空间重构:加拉特

案例三加拉特面积约3.37 km²,以20世纪60至70年代为解决二战后住房短缺问题而建设的大型居住区为主,是当时德国郊区居住空间的典范^[61]。80年代后期,社区开始采取空间改善措施——“加拉特1.0”计划,但这些措施无法使社区跟上城市发展的步伐。2014年,“加拉特2.0”空间重构计划被提出,当时,社区43.3%的居民拥有移民背景^[61]。2.0计划要求社区利用跨国合作网络与新的治理组织模式,与居民一起重组社区空间、塑造邻里品牌。

5 跨国空间重构的实践与机制

三个案例展示了全球、国家与地方动力在城市空间的合力作用。多层次网络的构建是跨国空间重构的基础,多重主体的互动是多层次网络发挥作用的关键,多项目联动治理是重构实践的手段和保障。三个案例具有趋同性与异质性。

5.1 多层次网络的构建

多层次网络的共性表现在治理的国际化 and 开放化上,异质性表现在案例中侧重的网络层次的差异。媒体港的政企网络将重点放在经济效果与投资吸引上;日本区突出在国家间跨国网络的长期构建上;加拉特强调自上而下的跨国合作网络。

政府与企业共同主导的跨国关系网络丰富了媒体港的运营结构,平衡了多方力量格局,激发了投资活力。第一,网络由各级政府部门、跨国企业、初创企业^①与本地社区共同建立。第二,政府制定优惠政策,提供创新平台,通过举办研讨会、社区活动、讲座等方式建立企业跨国合作网络。第三,本地企业与跨国企业通过自组织,建立自下而上的对话渠道。媒体港的杜塞尔多夫起点创业中心(STARTPLATZ Düsseldorf)是初创企业的联合办公空间,日常开展创业学院(Startup Academy)、企业家聚会等活动,成为企业家们的活动场所和联络地点。

日本区展示了德日跨国网络的出现和演变如何促进跨国经济、文化与社会空间的重构。初期,在双边国家级政府机构、大型跨国贸易公司的推动下,领事馆、日本俱乐部、学校等涉日机构在市中心片区成立^[56]。之后,在日本移民、涉日机构与本地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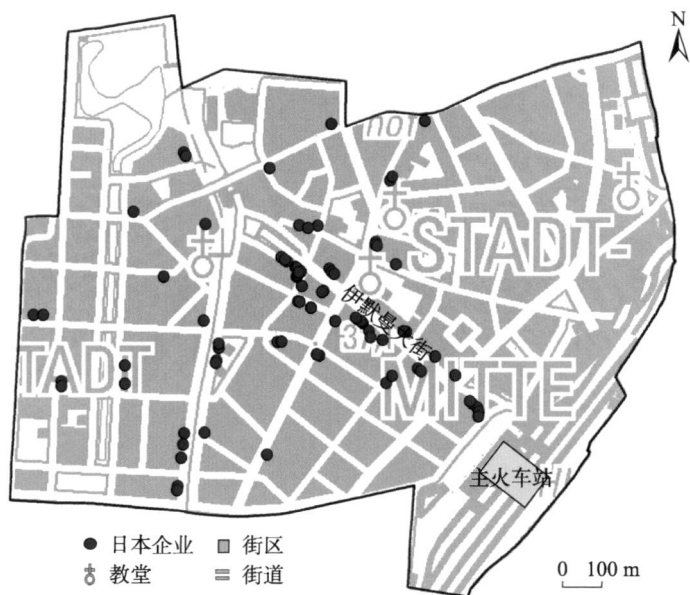


图6 聚集在市中心片区的日本企业

Fig. 6 Agglomeration of Japanese companies in city centre

注:该图基于杜塞尔多夫测量和土地登记局地图服务网站(<https://www.opengeodata.nrw.de/produkte/geobasis/tk/akt/tk50/>)下载的标准地图绘制,底图边界无修改。

机构的共同推动下,德日网络逐渐巩固和扩展,日本酒店、超市、诊所、律所、银行、餐馆、书店、旅行社等日本服务业和基础设施逐渐聚集,形成了德国最大的日本社区^[55]。

加拉特社区的2.0计划运用新的规划流程和手段,重组了治理模式^②,通过建立欧盟倡导、国家引导、联邦州指导、城市主持和社区配合的跨国合作网络,形成跨越行政边界的伙伴关系。从超国家层面看,加拉特社区通过加入欧洲城市重构的跨国联盟计划,进入跨国交流平台。在平台上,地方政策制定者与国际专家一起跨国调研,分享经验。在国家层面,社区被选为德国国家级试点项目,得到国家的资金和技术支持。在次国家一级,则强调区域协调发展和城郊衔接。

5.2 多主体的网络状互动

多主体在全球、国家与地方等尺度上形成网络状互动模式。将不同层级主体之间的互动视为垂直互动,将处于同一层级主体之间的互动视为水平互动。同一个主体可以同时存在垂直和水平两种互动模式。跨尺度的垂直互动更注重重构价值的建设,水平互动侧重于更为具体化的实施过程,例如基础设施的改善。在多层次互动的共性下,三个案例呈现出各自的特殊性。

媒体港的互动网络中,地方主体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城市政府将港区作为实现城市功能转型的空间工具。港区代表着城市在全球化进程中的新形象。地方政府部门、商业发展机构、企业协会等地方主体创造对话平台,分别与跨国企业进行了包括圆桌会议、焦点小组讨论、研讨会议、商业讲座、企业调研等走访与活动,鼓励不同国籍、不同文化背景的人进行交流和互动,分享投资意向,共同重塑城市跨国空间。落户的跨国企业积极加入当地协会与社区网络,表达投资与发展意愿。

日本区重构是国家之间的紧密联系下,全球与本地相互交融的长期过程。日本企业和移民希望被城市“看到”,他们通过成立协会、商会,开展文化活动等方式,持续、主动和深刻地影响空间重构。20世纪50年代后日本企业的投资加速了日本派遣机构的设立;70至90年代,日本商、协会和俱乐部等

非政府组织开始建立跨国交流网络,促进地方设施建设。21世纪以来,随着日本中小企业和研发机构投资的增加,城市作为日本在欧洲的经济文化中心的功

能得到加强^[59]。城市举办的日本动漫展、日本节等活动加速了日本潮流和饮食文化在德国的传播。日本区成为德日经济合作、社会活动、文化交流的空间。

在加拉特地区,作为全球主体的国际组织参与程度高、影响力大。国际组织将边缘社区纳入跨国城市网络,通过小组模式和认知互动等手段,实现从全球到地方的跨层级互动。第一,小组模式不仅涵盖欧洲城市联盟委员会、外国专家、有移民背景的居民等跨国主体,还包括各级政府、大学、协会、地方企业、住房机构、社区团体、社区居民等地方主体。社区根据重构计划、进度情况和主题内容等组建多个小组,并根据实际情况灵活调整组织场景与小组成员结构;或邀请新的参与者加入现有的组织结构,为现有网络注入新的动力。第二,认知互动,是国际组织凭借自身的国际项目运营经验,与地方主体共同创建与塑造社区未来发展的地方身份和核心价值,影响着地方主体的行为。国际组织将跨国移民视为创造多元生活和文化的动力,“带领”跨国移民进入到互动中。

5.3 非正式参与和治理系统

正式参与和非正式参与的组合运用是跨尺度治理模式顺利运行的保障。非正式参与具有高灵活性。案例中,非正式参与为跨国移民群体提供了更低的参与门槛:通过网络媒体、信息平台、留言板等非接触式交流渠道,以及工作坊、餐会、庆典、运动俱乐部、运动比赛、家庭日等多样化的面对面沟通途径,引导参与者,使其从被动参与到主动构建城市空间的未来。针对不同群体的多种参与工具,确保重构是多元主体相互博弈与协调后所达成的共识。

三个跨国空间重构案例体现了跨行政边界、跨学科、跨部门的网络治理系统与行动模式。第一,跨越国家、区域、城市边界的空间治理,促进全球与本地主体持续性地参与到规划、决策与实施中。第二,跨学科治理中,空间发展不再以城市规划专家为主

导,而是多重主体经过咨询、协调、谈判、调整、修改、解决和实施的过程,跨国非政府机构发挥着重要作用。第三,多重主体在地方全球化、全球地方化中相互磨合,互动互求,达到平衡,推动发展。第四,跨部门协作治理是自上而下发展与自下而上反馈的基础。

5.4 多项目联动治理

项目是联动治理的载体,通过同一项目内部和项目之间的多主体互动和多要素流动,实现平行空间与垂直空间的联动式治理。第一,跨国空间重构是在全球、国家、联邦州与城市等空间尺度行动框架下的精细治理,通过跨国经济、社会和文化等不同功能要素的联动,确保地区平行空间的均衡发展。第二,强调每个空间单元的紧凑性与质感。例如,对街道两侧的多层建筑进行内外翻新,提高垂直空间的使用密度,丰富垂直空间功能的多样性。

主体要素间的联动通过项目实现,将松散的关系转化为紧密的合作。纵向上,以各级政府为主轴,构建涵盖全球到地方一级相关部门的多项目联动式治理平台。各级政府制定政策和行动方案,管理空间重构的进度和项目分配的优先顺序。横向上,政府、社会、市场形成治理体系,企业、非政府机构与个人被赋权。有针对性地降低项目的参与门槛,鼓励平时难以发声的群体参与项目。

5.5 多要素的联动效应

要素的联动给城市带来活力。第一,空间功能要素的多样性。在重构过程中增强地方特色要素与跨国要素的组合作用。跨国移民和跨国景观促进了跨国空间独特氛围的形成。第二,跨国要素的广泛传播。媒体手段对城市跨国空间的宣传,加强国际化形象。例如,世界著名的“大富翁”游戏曾展示媒体港的标志性建筑。第三,跨国要素的可视化。例如,亚洲特色的城区氛围对城市国际化空间的形成具有特殊意义。伊默曼大街的日语标识在重构过程中得到政府部门的重视。第四,人口结构塑造了文化氛围的多样性。不同国籍、年龄的居民共享跨国空间,和谐共存。

各级政府文件中也多次强调了跨国空间的独特性。市政府通过制定旅游串联路线,设计文化艺术走廊,提高建筑景观的识别度,使跨国空间成为具有

吸引力的国际旅游流连区、集体活动场所、展览空间、影视拍摄场地、国际移民居住区等。

要素的联动带动了邻里价值的整合与重塑。多主体的良性互动,使邻里情感要素重新形成,情感要素作为整体力量,推动项目朝着积极的方向发展。在这一过程中,主体对自我身份和价值的认可,有助于加强要素的内在联系和地方的整体归属感。

6 结论与讨论

全球、国家和地方已是不可分割的体系,全球外生动力和城市内生动力重塑了城市空间。跨国空间是全球化时代城市内部典型的空间类型之一,其内部结构正动态发展着。全球、国家与地方的主体和元素的嵌入过程持续且漫长,从垂直或平行的单一结构,向纵横交错的多层次、多主体体系发展,从单一项目过渡到多项目联动。

本文认为,跨国空间重构与治理模式重组是相辅而成的过程。在治理模式重组下,多层次治理、多主体互动和多项目联动模式可以在城市空间产生良好的效果:通过多尺度规划体系与网络化治理,把握全球化大方向共性与兼顾地方化细节。多尺度下的多主体互动,是跨越国家边界、行政区划的网络状组织结构与行动模式,是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正式参与和非正式参与的结合。多项目联动有利于城市空间的均衡发展,在全球-国家-地方的同质化与异质性中有序、精细地规划处理,提高发展质量。因此,多层次网络是基础,多项目联动是手段,多主体互动模式是重构顺利完成的关键。

全球化与城市化给中国城市带来了机遇和挑战。城市中的现象已经超越了城市的物理边界,与全球联系在一起,全球现象又将随着联系进入城市,影响着地方动态。跨国投资的进入,加速了地方之间的竞争,“国际化”成为许多城市的发展目标。另一方面,城市经历着结构转型的阵痛,寻找自身在全球、国家和区域中的位置,城市增长与收缩并存。在中国,地方的发展同样存在着强烈的空间关系重构和尺度多向性。与西方国家尺度和国家权力被弱化不同的是,在中国,国家一直积极利用市场工具实现发展战略,“国家”尺度应该被重视。最后,在未来的研究中,应打破东方与西方、人类与非

人类、城市与乡郊、普遍性与特殊性等二元对立关系,将中国城市与西方城市共同纳入更广、更深层次的研究框架中。

致谢:真诚感谢匿名评审专家在论文评审中所付出的时间和精力,评审专家对本文研究思路、专题地图、结论分析方面的修改意见,使本文获益匪浅。诚挚感谢德国科隆大学的罗菁博士研究生,对本文调研工作的帮助。

注释:

①这里的初创企业(start-ups)指广义上的初创企业,即成立不到10年、拥有创新的商业模式或基于知识和技术的商业模式的公司。

②加拉特项目是欧盟跨国城市合作网络URBACT III“郊区>城市·重塑边缘”(sub>urban. Reinventing the fringe, 2014-2020)的其中一个社区层面项目,URBACT III通过跨国交流、能力建设等措施,提升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政策管理、设计和实施能力,实现跨国信息共享与知识分享。

参考文献:

[1]Sigler T J. After the 'world city' has globalised: Four agendas towards a more nuanced framework for global urban research. *Geography Compass*, 2016, 10(9): 389-398.

[2]吕卫国,陈雯.制造业企业区位选择与南京城市空间重构. *地理学报*, 2009, 64(2): 142-152.

[3]马学广,王爱民,闫小培.城市空间重构进程中的土地利用冲突研究:以广州市为例. *人文地理*, 2010, 25(3): 72-77.

[4]杨叠涵,陈江龙,袁丰.南京城市空间重构对土地出让时空演化影响研究. *地理科学进展*, 2015, 34(2): 246-256.

[5]冯健,刘玉.转型期中国城市内部空间重构:特征、模式与机制. *地理科学进展*, 2007, 26(4): 93-106.

[6]吴启焰.新自由主义城市空间重构的批判视角研究. *地理科学*, 2011, 31(7): 769-774.

[7]杨显明,焦华富.转型期煤炭资源型城市空间重构:以淮南市、淮北市为例. *地理学报*, 2016, 71(8): 1343-1356.

[8]郭嘉颖,魏也华,陈雯,等.空间重构背景下城市多中心研究进展与规划实践. *地理科学进展*, 2022, 41(2): 316-329.

[9]Häußermann H, Siebel W. Die schrumpfende Stadt und die Stadtsoziologie. In: Friedrichs J(Eds.). *Soziologische Stadtforschung*. Wiesbaden: VS Verlag für Sozialwissenschaften, 1988: 78-94.

[10]柴彦威,刘天宝,塔娜.基于个体行为的多尺度城市空间重构及规划应用研究框架. *地域研究与开发*, 2013, 32(4): 1-7+14.

[11]王立,薛德升.世界城市跨国空间研究的分野与合流. *人文地理*, 2017, 32(5): 69-75.

[12]梅琳,薛德升, Frauke Kraas. 跨国机构与地方共同作用下的城市全球化:德国波恩的案例研究. *地理学报*, 2014, 69(2): 156-168.

[13]尹铎,杨蓉,林婕璇.全球化背景下跨国餐饮空间的多元感知与消费实践:以广州 Zagol Habesha 餐厅为例. *旅游学刊*, 2023, 38(2): 134-147.

[14]Jackson P, Crang P, Dwyer C. Introduction: The spaces of transnationality. In: Crang P, Dwyer C, Jackson P(Eds.). *Transnational Spaces*. London: Routledge, 2004: 1-23.

[15]Collyer M, King R. Producing transnational space: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and the extra-territorial reach of state power.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2015, 39(2): 185-204.

[16]杨庆媛,罗奎,劳昕.基于地理学视角的国际空间规划嬗变与启示. *地理学报*, 2020, 75(6): 14.

[17]Yusuf S, Wu W. Pathways to a world city: Shanghai rising in an era of globalisation. *Urban Studies*, 2002, 39(7): 1213-1240.

[18]Presas L M S. Transnational urban spaces and urban environmental reforms: Analyzing Beijing's environmental restructuring in the light of globalization. *Cities*, 2004, 21(4): 321-328.

[19]Ley D. Transnational spaces and everyday lives. *Transactions of the Institute of British Geographers*, 2004, 29(2): 151-164.

[20]贺灿飞,毛熙彦.尺度重构视角下的经济全球化研究. *地理科学进展*, 2015, 34(9): 1073-1083.

[21]Brenner N. *New Urban Spaces: Urban Theory and the Scale Ques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9.

[22]Brenner N. Globalisation as reterritorialisation: The re-scaling of urban governance in the European Union. *Urban Studies*, 1999, 36(3): 431-451.

[23]Amin A. Spatialities of globalisation.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 Economy and Space*, 2002, 34(3): 385-399.

[24]Swyngedouw E. Globalisation or 'glocalisation'? Networks, territories and rescaling. *Cambridg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2004, 17(1): 25-48.

[25]吴骞.尺度重构下的国外首都特大城市地区空间规划分析. *国际城市规划*, 2019, 34(2): 78-85.

[26]杨亮洁,任娇杨,杨永春,等.尺度重构视角下中国城市多元网络结构研究. *经济地理*, 2021, 41(9): 48-58.

[27]德国联邦建筑 and 区域规划局.德国城市发展和城市规

划:概述,2000.https://www.bbsr.bund.de/BBSR/DE/veroeffentlichungen/abgeschlossen/berichte/2000_2005/Bd05StadtentwicklungStaedtebau.html;nn=395966,2022-08-20.

[28]Saito A. Global city formation in a capitalist developmental state: Tokyo and the waterfront sub-centre project. *Urban Studies*, 2003, 40(2): 283-308.

[29]周尚意,吴莉萍,张瑞红.浅析节事活动与地方文化空间生产的关系. *地理研究*, 2015, 34(10): 1994-2002.

[30]Arboleda M. Revitalizing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 A Marxian critique of more-than-human geographies.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D: Society and Space*, 2017, 35(2): 360-378.

[31]夏添,孙久文.基于区域经济学理论的新时代空间尺度重构研究. *城市发展研究*, 2019, 26(6): 13-20.

[32]李子枫,黄耿志,薛德升.全球化背景下多主体推动的滨水区更新:以德国科隆莱茵瑙港为例. *国际城市规划*, 2021, 36(3): 122-128.

[33]周寄中,张贵林,侯亮.产业链两端的“R&D与服务”联动:价值创新的核心. *中国软科学*, 2007, (2): 49-52.

[34]林兰,叶森,曾刚.长江三角洲区域产业联动发展研究. *经济地理*, 2010, 30(1): 6-11.

[35]卢涛,周寄中.我国物联网产业的创新系统多要素联动研究. *中国软科学*, 2011, (3): 33-45.

[36]何颖珊.产业联动视角下共建“一带一路”价值链治理模式研究. *广东社会科学*, 2020, (6): 39-46.

[37]德国联邦内务与内政部.联邦政府城市发展报告 2020, 2021. <https://www.bmi.bund.de/SharedDocs/downloads/DE/veroeffentlichungen/2021/04/stadtentwicklungsbericht-2020.html,2022-08-20>.

[38]Mäntysalo R, Jarenko K, Nilsson K L, et al. Legitimacy of informal strategic urban planning: Observations from Finland, Sweden and Norway. *European Planning Studies*, 2015, 23(2): 349-366.

[39]Bäcklund P, Häikiö L, Leino H, et al. Bypassing publicity for getting things done: Between informal and formal planning practices in Finland. *Planning Practice & Research*, 2018, 33(3): 309-325.

[40]温权.城市空间重构的微观正义隐忧:基于当代中国城市化进程的批判性反思. *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6, 30(5): 8-14.

[41]王列辉,苏晗,张圣.港口城市产业转型和空间治理研究:以德国汉堡和中国上海为例. *城市规划学刊*, 2021, (2): 45-52.

[42]关于,阳建强.城市空间重构影响下城市边缘区更新研究:以常州清潭片区为例. *现代城市研究*, 2012, 27(5): 65-71.

[43]陈畅,刘爱华,周威.快速城镇化中城市边缘区人口空间重构初探:以天津市为例. *城市规划*, 2016, 40(10): 17-22.

[44]王祯,张街春,刘思绎,等.中国城市老工业园区更新的空间治理机制研究:多层次视角的分析框架. *地理研究*, 2022, 41(12): 3273-3286.

[45]葛天任,李强.从“增长联盟”到“公平治理”:城市空间治理转型的国家视角. *城市规划学刊*, 2022, (1): 81-88.

[46]刘雅君,蒋国梁.城市收缩对数字经济发展的影响及作用机理:来自中国城市的经验证据. *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3, 46(1): 150-160.

[47]孙平军,彭雅丽,周馨雨.集约用地视角东北三省城市收缩效应诊断与作用机理研究. *地理研究*, 2023, 42(1): 106-122.

[48]世界城市研究小组(GaWC).根据世界城市研究小组所分类的世界.<https://www.lboro.ac.uk/microsites/geography/gawc/gawcworlds.html,2022-10-28>.

[49]Blotvogel H H. The Rhine-Ruhr metropolitan region: Reality and discourse. *European Planning Studies*, 1998, 6(4): 395-410.

[50]杜塞尔多夫州首府统计与选举办公室.杜塞尔多夫市统计数据.<https://www.duesseldorf.de/statistik-und-wahlen/statistik-und-stadtforschung/statistische-daten.html,2023-04-10>.

[51]杜塞尔多夫州首府统计与选举办公室.城区概况:城区与城市片区.<https://www.duesseldorf.de/statistik-und-wahlen/statistik-und-stadtforschung/statistische-daten.html,2023-04-10>.

[52]杜塞尔多夫州首府统计与选举办公室.杜塞尔多夫统计年鉴 2009.<https://www.duesseldorf.de/statistik,2022-01-28>.

[53]Mauer B, Blasczyk M, Schwarz D, 等.杜塞尔多夫市:七个世纪的城市发展历程.<https://www.duesseldorf.de/touristik/duesseldorf-vom-fischerdorf-zur-metropole/,2022-10-18>.

[54]杜塞尔多夫州首府经济发展办公室.作为商业地点的城市:杜塞尔多夫. <https://www.duesseldorf.de/wirtschaftsfoerderung/standort,2023-06-10>.

[55]Schlunze R D. Spatial diffusion of Japanese firms in West Germany and West Berlin from 1955 to 1989. *Geographical Review of Japan*, 1992, Series B 65(1): 32-56.

[56]Li Z. The development of urban transnational spaces in the world city: The Japanese case in Düsseldorf, Germany. *European Planning Studies*, 2023, 31(6): 1139-1159.

[57]Glebe G. Segregation and intra-urban mobility of a high-status ethnic group: The case of the Japanese in Düsseldorf. *Ethnic and Racial Studies*, 1986, 9(4): 461-483.

[58]Paul G, Claus S. Phasen internationaler Migration und ihre Auswirkungen auf Raum- und Siedlungsentwicklung in

Deutschland seit 1945. In: Paul G(eds) Räumliche Auswirkungen der Internationalen Migration. Hannover: Verlag der ARL-Akademie für Raumforschung und Landesplanung, 2014: 127-161.

[59] Jäger K. Japans Hauptstadt in Deutschland—wie Düsseldorf sich zum wichtigsten Ziel Japanischer Investitionen machte. Standort, 2017, 41(1): 20-26.

[60] Heidbrink I, Kurtenbach S. Das Verhältnis von Ankunft-

sgebieten und innerstädtischen Wanderungsmustern: Eine untersuchung am beispiel der Landeshauptstadt Düsseldorf. Stadtforschung und Statistik: Zeitschrift des Verbandes Deutscher Städtestatistiker, 2019, 32(1): 50-57.

[61] 杜塞尔多夫州首府城市规划办公室. 加拉特 2.0: 塑造变革. <https://www.duesseldorf.de/stadtplanungsamt/stadterneuerung/g/garath-20>, 2022-10-18.

Spatial Reconstruction and Global-Local Interactions of Governance in Transnational Space: Case Studies in the City of Düsseldorf, Germany

Li Zifeng Huang Gengzhi Xue Desheng

Abstract: Urban space is profoundly influenced by globalization. The impact of globalization on urban space attracts lots from attention of scholars, as transnational space, which is a new type of urban space, has emerged. Transnational spaces are becoming important components of the cities in the global era. Much research pursues emphatically the formation process and driving forces of urban transnational space. However, recent studies seldom address the issue of spatial reconstruction as well as the governance mechanism of urban transnational space. In order to fit this gap, this paper develops a research framework to study the spatial reconstruction and governance mechanism of urban transnational space in Germany. This research framework is based on multiple perspectives by regarding the governance of transnational space as a multi-scalar process engaging with multi-actors. Further onwards, this paper analyses three cases in the city of Düsseldorf in Germany. The study cases are urban transnational spaces that are located in either the city centre or urban periphery area. By using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research methods,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mechanism of spatial reconstruction and governance in these urban transnational spaces. In doing so, we find that: firstly, spatial reconstruction of transnational space is a spatial strategy of urban development, which is under the reorganization of urban governance. Secondly, the governance of transnational space involves the interaction of multiple actors within multi-level transnational networks, which is a crisscross mode of structure and action with global-local networked shape that crosses administrative boundaries. Thirdly, multi-level network is essential for transnational spatial reconstruction, when the network-like interactions of multiple actors are keys to the functioning of multi-level networks, and the linkage of multi-projects is the means to the practice of governance. Fourthly, the combination of formal planning tools and informal measures promotes the governance of transnational space, when informal planning tools and measures are found to be more flexible. Fifthly, the linkage of multi-projects not only facilitates the equilibrium development of the city, but also improves the quality of urban internationalization. Finally, this paper suggests that the research framework of transnational spatial reconstruction and governance can provide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how deeply globalization influences urban space.

Key words: transnational space; spatial reconstruction; governance mechanism; global-local interaction; Düsseldorf